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

中国
近代
日语
与
日本

卞立强 译

安藤彦太郎 著
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

卞立强 译

近	中
代	国
日	语
本	与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

安藤彦太郎 著
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中国语与近代日本

〔日〕安藤彦太郎 著

卞立强 译

责任编辑：广 林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大学校内）

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90千字

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3,000册

ISBN 7-301-01434-1/G·71

定价：9.00元



安藤彦太郎

前 言

在日本所学习的各种外语中，恐怕没有一种外语的名称像中国语这么变化多端。古代最初叫唐话，明治维新以后称汉语、清语、清国语，等等。以后又不断地变化，称支那语、华语、中国语。日本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时期，曾经称之为满洲语、满语等。这并不是指中国的少数民族——满族的语言，实际上是说中国语。此外还有“奴国语”^①之类的蔑称，这个词现在还没有完全成为死词。

英语、法语、德语乃至俄语，不论是时代发生了变化，还是发生了革命，名称都没有变化。中国语的名称在日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仅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日中关系的复杂性。另外，这里要说明一下：中国除汉民族以外，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。由于考虑到这一点，中国把我们所谓的中国语正式称作汉语。不过，中国的汉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4%，日本一般把汉民族的语言称作中国语。因此，这里仍沿袭这个惯称。

①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一部分人蔑视中国，称中国为“奴国”。
——译注

写作本书的意图是，根据这种复杂的日中关系，通过中国语教育这个小小的窗口，来窥视一下近代日中关系的历史，以及日本近代思想的实况。对于日本人来说，深思一下什么是中国语这个问题，就会把各种各样的问题抛到我们的面前。

所以这本书并不是谈语言本身的书。我深知自己力量不足，不能充分地写出自己的意图。不过，这一点如果姑且不说，我还是希望那些与中国语毫无关系的人们也能读一读这本书。当然，对于那些学习过中国语、或正在学习中国语的人们，本书会提供一些应当知道的知识。

我本人对中国语虽然并不是外行，但不是中国语学者。像我这样的人终于要写这样书，其动机准备留在“后记”中去谈。由于这样的原因，本书在涉及中国语本身的地方，从中国语这门学问最近的情况来看，我担心可能有理解肤浅之处。在这方面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。

中文版序言

本书是为了使日本人、特别是使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具有正确的认识而写的。日本人一般有一种倾向，尊崇中国的古典中所描绘的中国，轻视现实中的中国，把这两者看作好似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而且他们所尊崇的古典中的中国也是根据日本的观点来看的，与实际的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。这是日本人的思想的问题，有必要从历史上探明这种倾向形成的过程。本书试图从中国语教育的角度来阐明这一思想的问题。

下面我想为中国的读者简要地说明一下日本现行的教育制度。

日本的小学校（满6岁时的4月入学）是6年制，中学校（相当于中国的初级中学）是3年制，这9年期间是义务教育，就学率是100%。上面是3年制的高等学校（相当于中国的高级中学），就学率约为同龄青年的90%。再上面基本上是4年制的大学，其就学率超过30%。以上就是战后今天日本教育制度的状况。战前的教育制度略有不同，就学率也低，如大学的就学率虽因

时期而有差异，但大体上可以说在5%以下。

一入中学校，就教授简单的中国古文，称之为“汉文”。“汉文”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教授，其简单的词句通过报刊的标题及标语口号等形式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不过，其读法与中国的读法完全不一样，称之为“训读”，即按照日语的语序，当作日语来读。如“读书”这个词，它已日语化，日本人一看就可以理解，但其发音与中国的古代音相近，读成“doku sho”。不过，如把它“训读”，则为“sho wo yomu”。“sho”是“书”，“wo”表示目的格，“yomu”是“读”的意思。但“yomu”中的“yo”是“读”的读音，“mu”是添加在它后面的语尾。而且这个“mu”随着后续语句的不同，或为“meba”，或为“mite”，发生各种变化。

日本人对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或唐诗等都是通过这种“训读”的方法来理解的，所以它们已经不是中国的古文，恐怕也可以称之为日语。中国的古典对日本人来说，看作就好像是自己国家的古典，所以不能说因为日本大量阅读中国的古典而认为对中国非常关心。

日本人就是这样通过“汉文”的“训读”来了解中国的古典的。除了中国外，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像日本人那样具有中国古典的知识：恐怕没有一个日本人不知道孔子、孟子或李白、杜甫的名字。

但是，就是这样的日本人，对于近代以后的中国的知识却是极其贫乏的。知道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史上人物的名字的人很少，知道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之

类事件名称的人也不多。即使知道，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模糊。在中国语方面也是同样。

日本人尽管通过“训读”而对中国的古典具有一定的知识，但懂得现代中国语的人并不多。这里要谈一下日本的外语教育。日本的孩子一进中学校，英语就成为必修课。中学校是义务教育，所以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受到初步的英语教育。这种英语教育一直要继续到大学。

一入大学，基本上要学两种外语。英语一般是第一外语，是必修课；此外还必须选修一门第二外语。第二外语有德语、法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中国语等，但很多大学没有开设中国语。而且绝大部分学生都选修德语或法语。选修中国语的学生的人数虽然不太清楚，但恐怕不过是整个大学生人数的1%左右。

不过，战后学习中国语的学生剧增。战前除了外语学校及一部分私立大学外，没有学校教授中国语。所以学习中国语的人很少，因而中国语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都极其落后，其影响一直涉及到今天。这有日本人轻视现实的中国的中国观的反映，其后果对日中关系也留下了微妙的阴影。对这一点进一步深究下去，还可了解其深处存在着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教育的问题。

我写本书的目的是，在指出这种状况的基础上，希望日本人能建立立足于日中友好之上的正确的中国观。它也许会有助于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。

北京大学的卞立强先生为本书的翻译作了很大的努力。卞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并

向为本书的出版而操心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先生致谢。

安藤彦太郎

1990年11月于东京杉并家中

目 次

一 中国语与战前的教育制度	(1)
1 所谓的“特殊外语”	(1)
2 明治前期的中国语教育制度	(8)
3 关于“民间”	(12)
4 中国语与眼药的关系	(17)
二 《急就篇》及其他	(22)
1 宫岛大八与二叶亭四迷	(22)
2 “问答体”教材的系列	(27)
3 关于《急就篇》	(31)
4 “问答体”教材以后	(35)
三 中国语与汉文	(39)
1 对中国认识的双重结构	(39)
2 “目读主义”与“会话主义”	(45)
3 “唐音论”的传统(1)	(49)
4 “唐音论”的传统(2)	(53)
四 中国语教育的流派	(58)
1 中国语教育的流派	(58)

2	中国语教师的类型	(63)
3	科学研究的先驱	(68)
4	另一位先驱的业绩	(72)
五	战争与中国语	(78)
1	“战争外语”	(78)
2	时文	(83)
3	“沿线官话”	(88)
4	战争期间的一段经历	(92)
六	战争下的胎动	(98)
1	中国的新动态	(98)
2	曲折与摸索(1)	(103)
3	曲折与摸索(2)	(108)
4	向“理论与实际”投下的一块石子	(114)
七	战后的中国语普及运动	(121)
1	中国语普及运动	(121)
2	“中国语是外语”	(125)
3	发音标记的问题	(130)
4	什么是“友好”	(138)
八	溪流汇成大河	(142)
1	关于辞书	(142)
2	异文化	(148)
3	几个问题	(153)
4	作为教养的中国语	(157)
后 记		(162)

一 中国语与战前的教育制度

1 所谓“特殊外语”

“胡同里的外语”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，一直在学习中国语。但是，像英语、德语、法语等是主要为了吸收对方国家的文化而学习的外语。相反，中国语被看作是一种不必顾及其文化背景、以实用会话为中心的“特殊外语”，仅有极少数人去学。如果把英语等——特别是德语和法语——看作是所谓高级人士所使用的大街上的外语，那么，中国语也可以说是小胡同里的外语。

这里让我们极其概略地看一看战后教育改革实行以前的教育制度。这种教育制度被称作是复线型教育制度。其情况如下：

以前学生从小学寻常科（6年）毕业后，分为立即到社会上工作和升入高一级学校两类。当时还没有禁止12岁男女儿童劳动的法律。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，又分为进入小学高等科（2年）而结束学业和进入实业学校以及进入中学三种。

小学高等科毕业后还希望进一步升学的人，则进入

5年制的师范学校。在新学制中，师范学校已由中等学校跳两级而变为学艺大学。实业学校是5年制，分为商业学校、工业学校等，在新学制下已变成商业高等学校等。中学也是5年，女子中学则称为高等女学校，在新学制下变为高等学校。

其中主要是中学结业后而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人。他们分为升入专门学校和升入高等学校两类。专门学校基本上是3年制，如高等商业学校、高等工业学校和外语学校等，在新学制下都升格为大学。高等学校是3年，仅收男生，几乎全部是官立的，在新学制下大部分都变成了各地国立大学的教养部。

而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全部都升入大学（基本上是3年）。进入实业学校或专门学校等的学生，虽然并不是不可能升入大学，但有一些困难。总之，所谓尖子道路，就是由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学校到大学的道路，尤其是指由各地的官立高等学校进入帝国大学的道路。

中学学习5年毕业后才能进入高等学校。但可以在第4年接受考试。修完4年而考试合格的人被视为优秀学生。他们一进入高等学校，当然就是走上了尖子的道路。高等学校分文科和理科。另外根据其主修的外语，称英语班为文科甲类和理科甲类，称德语班为文科乙类和理科乙类。还有一部分高等学校设有把法语当作第一外语的文科丙类（部分学校还没有理科丙类，但不久就废止了）。

战前的这条尖子道路不仅没有把中国语和俄语当作

第一外语来开设，就连作为第二外语也未开设过。首次开设是在战后的1946年，第一高等学校（现在的东大）、第四高等学校（金泽）、第五高等学校（熊本）和山形高等学校开设了学俄语的文科丁类，第一高等学校和山口高等学校开设了学中国语的文科戊类（班级的名称因学校而异）。

这种情况在进入大学之后也是同样。战前的社会科学系统的院系当然不会开设中国语（现在的专业科目中也很少开设用中国语读原著的课程），就连文学院系的支那文学科和东洋史学科，中国语也不是必修的。

日本所谓的“支那文学”，是按日本训读汉文的方式来阅读中国的古典，和中国语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一点和英文学科同英语的关系根本不一样。一般所谓的“支那文学”专家都不懂中国语。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实际情况是，在选修课程中虽有“支那语”，一个时期曾经也称之为带括号的“支那语（俗语）”，但那不是正式的讲座，一向是由外国的讲师来教授明治时代的袖珍本会话教科书《急就篇》。

中国语是低级官员的事 外交官的情况是这样：现在基本上仍在实行的外交官录用考试制度是在日清战争开始的1894年形成的。而通过高等文官——外交官——考试合格的外交官，80%以上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出身，其余的大部分是东京商科大学（现在的一桥大学）出身，除此之外，只有极少数例外，所以和中国语基本上毫无关系。

就外语来说，另外还有留学生和书记生的考试。中国语合格的人大部分是东京外国语学校（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）和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出身。他们不是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而录用的，不能当大使或公使，被看作是掌握“特殊外语”技能的人。

1941年仓石武四郎著的《中国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》一书，给战争时期的中国语教育的现状投下了一块石子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驻在北京或南京的官员，中国话说得好的大多是低级官员。身居要职的人基本上不能说像样的中国话，最多只能说两句“要仆役端茶来！”“要买古董。”之类的话。……外交官要升到较高的地位，欧洲语的修养受到极大的重视。而中国语则毫无关系。所以也没有人在学生时代热心学习过中国语。最多不过是从欧洲转到中国之后才开始学习一点。

总之，中国语不是大学里所修的外语，最多不过是专门学校所学的外语。当时除了外国语学校外，只有一些官立高等商业学校（如山口高商、长崎高商、神户高商等。按新学制都升格为大学了）开设了中国语。

从旧制一高进入东大、奠定战后中国语教育的基础的仓石武四郎先生（1897～1975），继承其事业的藤堂明保先生（1915～1985），以及由大阪高校入东大支那文学科、最早把鲁迅的文学传到日本的竹内好先生（1910～1977）等，他们在高等学校当然没有学过中国语，就是在大学也没有通过正规的讲座正式学习过中国语。现在

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。

竹内先生写过这样的话：“我们今天掌握了一点像样的中国语，都是依靠自学和沾了少数中国语学者的著作的光，而决不是由于帝国大学。”（《日本的中国语教育的贫乏——“中国文学”后记》，《中国文学》第71号，1941年。收入1978年出版的《作为方法的亚洲》）因此可以说，这些先驱者的业绩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私立大学的一个事例 私立学校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，不用说像拓殖大学那样的学校，其他一些私立大学的预科（相当于旧制高等学校）和本科（学部）都开设了中国语。早稻田大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由于大隈重信很关心中国，虽然仅限于政治经济学部等一部分院系，但从明治时代就开设了中国语。这也许因为私立学校本身就是“小胡同”里的学校吧。说来有点惭愧，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例子。

1943年，我在神奈川县立一中学习，准备学完四年级后就参加官立高等学校的考试。可是，在考试的前夕遇上母丧，感到自己只能入私立学校，而且希望四年就结束中学生活，改变一下心情，因此进了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一早稻田高等学院文科（和官立高等学校一样，分为文科和理科）。我如果进了官立高等学校（也许不被录取），那将按文科乙类的志愿，编入德语班，一辈子和中国语无缘了。

向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提出入学申请书时，第二外语中有中国语，我毫不犹豫地上面划了圈。这是因为